

陈祥耀

唐宋八大家文說



世冠坐而問客曰何為其
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
相與縈乎此非孟德
相與縈乎此非孟德

福建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文说

陈祥耀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年·福州

20.7081
(闽)新登字 02 号

唐宋八大家文说

陈祥耀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莆田市城厢区沟头 邮编:3511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10 千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4—1676—7/G·1305 定价:10.9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工厂负责调换

自序

唐宋八大家，谓唐之韩愈退之、柳宗元子厚，宋之欧阳修永叔、曾巩子固、王安石介甫及苏洵明允、苏轼子瞻、苏辙子由也。其称举，不始于茅坤。明初朱右编《八先生文集》，先于茅氏；唐顺之《文编》，于唐宋亦录八家文，与茅同时。然茅氏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选文既富，评语亦多；自其书出，“八家”一名乃大行，相沿不绝。唐宋之文，佳者不止八家；然如清人姚鼐论文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之美者，八家固最足为代表。故读唐宋文而从八家入，非不宜也。昔余杭章太炎论文，轩魏晋而轻唐宋，尤轻所谓“吴蜀六士”；“六士”，指宋六家。夫魏晋固足尚，唐宋之韩、柳与“六士”，又何可轻？太炎通人，此说出于早年，晚岁未必坚持也。

八家之文，各有特色与短长。前人为之比较者，如宋王十朋《杂说》：“子厚之文，温雅过班固；退之之文，雄奇似司马子长。欧阳公得退之之纯粹，而乏子厚之奇；东坡驰骤过诸公，而简严不及也。”“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陈造《题六君子古文后》：“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浑厚而古”，“南丰之密而古”。高似孙《纬略》：“韩愈

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柳宗元卓伟精致。”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轼）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吕本中《童蒙诗训》：“韩退之之文，浑灏流转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李涂《文章精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退之虽时有讥讽，然大体纯正。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慨，子瞻兼愤激、感慨而发之以谐谑。”元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古文之法，则本韩、柳；议论之法，则本欧、苏。”明宋濂《王君子与文集序》：“韩、柳之古健，欧、苏之峻雅。”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吞吐聘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巉岩剜削，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道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可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苏长公也。……曾巩、王安石、苏洵、辙，至矣；巩尤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苶而不能副焉。”王世贞《艺苑卮言》：“韩、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临川氏，法而狭。南丰氏，饬而衍。”清魏禧《杂说》：“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灵怪。子厚如幽林怪壑，鸟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其奏札刚健剴切，终带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发令，虽无理事，谁敢不承？东坡如长江大河，时或流为清渠，渚为池沼。子由如晴丝袅空，其雄伟者如天半风雨，袅娜而下。介甫如断岸千尺，又如

高士，黜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泽春涨，虽漫漶而深厚有气力；《说苑》等叙，乃特谨严。”方苞《古文约选》序例：“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答程夔州书》：“昌黎作记，多缘情事为波澜；永叔、介甫则别求义理以寓襟抱。柳子惟记山水，雕刻众形，能移入之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昌黎出入孟子，陶熔司马子长，六朝后固为文字中兴。维时雄深雅健，与之角者，柳州也。庐陵得力昌黎，上窥孟子。老泉之才，横矫如龙蛇。东坡之才大，一泻千里，纯以气胜。颖滨淳蓄渊涵。南丰深湛经术，又一变矣。要皆正人君子，维持文运。半山之文，纯粹狠戾互见，芟而存之，勿以人废言可也。”刘大猷《唐宋八家文百篇序目》：“予谓论则韩、苏；书则韩、柳；序则韩、欧、曾；碑志韩、欧、王；记则八家皆能之，而以韩、柳、欧为最；祭文则韩、王。三苏之所长者一，曰论；曾之所长者一，曰序；柳之所长者二，曰书曰记；王之所长者二，曰志曰祭文；欧之所长者三，曰序曰记曰志铭；韩则所在皆长。”《论文偶记》：“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吴振乾《唐宋八家文类选序》：“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别流派矣。即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纤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范泰恒《古文凡例》：“韩昌黎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高处尤在诸碑志，出入典故，庄古无伦。欧公学其议论，不学其序事，实不能学也。……柳州骨力远超宋人，其诸记住矣，但句调似赋，少昌黎参差高下之致，自来无人道及。欧文谓并

韩，非也。……欧公议论，时有韩之变化，而奇矫不逮，且多近俗处。……碑版、《五代史》，叙事近《史记》，又多可取。……王介甫文叙事逊欧，而议论胜之；其道折处，文品尤贵，更非曾所及也。……老泉之文，老健沉着，应在大苏上。子瞻诸策，笔太直而少变化，气太纵而少淳蓄，识见固高，文品较下，不从韩、柳、欧、王历观之，不知也。……子由之文近父兄，而骨力较嫩，虽曰袅袅可爱，然太近时矣。南丰多实语，少变动。”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宋代诸公，变峭厉而为平畅。永叔情致纡徐，故虚字多；子瞻才气廉悍，故间架阔。”刘开《复陈编修书》：“曾子固醇而不肆，苏明允肆而不醇，兼之者仅昌黎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深于《国语》，王介甫深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至昌黎始工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虽各言所得，未足尽凭，可供参考焉。

予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唐宋散文”课，以八家文为主，苦其篇章浩瀚而学者一时难于遍览也，乃为之择要讲述，俾稍明主次而肄业焉。讲稿所积，续为董理成篇。然时经十有余载，随作随辍，前后行文不尽一致，而大体固皆先总说而后分文体评述也。其中徐世泰东雅堂本《昌黎先生集》、廖莹中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分体较碎，姑仍之。于八家之文，提要钩玄，其法略兼古人所谓“解题”、今人所谓“导读”而一之。又颇采录古人评语，非曰其言尽当，亦非曰其言尽契鄙怀，取其能广读者之心思耳目，为涵泳自得作对照耳。稿成，以为

不徒可作研究生教材，于有志治唐宋文者，亦庶几可为其求津逮、涉门庭之一助乎？因不揣浅陋而付之刊布。古人往矣，来者难诬，强为解事，唐突不免。匡而正之，奚必如丁敬礼之以为难求耶？

公元一九九三年，夏历癸酉六月，陈祥耀自
序于福建师范大学之意园，时年七十有二。

(20)	一、韩愈文说	(1)
(80)	总说	(1)
(80)	赋、论及杂著	(10)
(80)	记	(21)
(501)	志墓、书碑	(23)
(511)	目 序	(28)
(511)	哀祭文	(33)
(211)	碑、志	(37)
(551)	录 杂文	(42)
(551)	表、状、实录	(42)
(281)	二、柳宗元文说	(45)
(281)	总说	(45)
(781)	雅诗	(52)
(781)	辞赋	(54)
(041)	论文	(56)
(081)	碑、状、志、诔	(63)
(121)	对、答、说	(68)
(321)	传	(72)
(321)	骚	(74)
(321)	吊、赞、箴、戒及杂题	(75)
(021)	序跋	(76)
(221)	记	(80)
(151)	书启	(88)
(351)	祭文	(90)
(581)	外集及《非国语》	(91)

(10)	三、欧阳修文说	(93)
(11)	总说	(93)
(01)	赋	(98)
(12)	论文	(98)
(83)	碑、状、墓志	(102)
(82)	传	(112)
(88)	记	(112)
(73)	序	(115)
(21)	祭文	(122)
(94)	书启	(123)
(21)	奏章	(128)
(81)	札记、题跋	(135)
(27)	四、苏洵文说	(137)
(42)	总说	(137)
(67)	论文	(140)
(83)	奏章	(150)
(88)	书	(151)
(37)	杂文	(153)
(47)	五、曾巩文说	(156)
(27)	总说	(156)
(67)	论文	(160)
(02)	序	(165)
(22)	书	(171)
(02)	记	(175)
(19)	奏章	(182)

(838)	祭文.....	(184)
(882)	墓志、碑、状.....	(185)
(908)	六、王安石文说	(188)
(925)	总说.....	(188)
(939)	奏章.....	(192)
(961)	论文.....	(198)
(981)	杂著.....	(213)
(988)	书启.....	(214)
	记.....	(217)
(102)	序.....	(220)
	哀祭文.....	(221)
	碑、志	(222)
	七、苏轼文说	(225)
	总说.....	(225)
	赋.....	(233)
	论文.....	(235)
	奏章.....	(247)
	序.....	(253)
	记.....	(254)
	传、状、碑、志	(259)
	祭文.....	(261)
	书启.....	(262)
	题跋、杂记	(267)
	八、苏辙文说	(269)
	总说.....	(269)

(273)	论文	(273)
(292)	奏章	(292)
(296)	书启	(296)
(297)	记	(297)
(299)	序跋	(299)
(300)	墓志、碑、传	(300)
(301)	祭文	(301)
(302)	辞赋、赞	(302)
(304)	附录 钱基博评八家文	(304)
(305)	文辞	
(306)	志、记	
(307)	散文辞表	
(308)	总	
(309)	赋	
(310)	文辞	
(311)	辞表	
(312)	总	
(313)	志、记、辞表	
(314)	文辞	
(315)	辞表	
(316)	总	
(317)	志、记、辞表	
(318)	文辞	
(319)	辞表	
(320)	总	
(321)	志、记、辞表	
(322)	文辞	
(323)	辞表	
(324)	总	
(325)	志、记、辞表	
(326)	文辞	
(327)	辞表	
(328)	总	
(329)	志、记、辞表	
(330)	文辞	
(331)	辞表	
(332)	总	
(333)	志、记、辞表	
(334)	文辞	
(335)	辞表	
(336)	总	
(337)	志、记、辞表	
(338)	文辞	
(339)	辞表	
(340)	总	
(341)	志、记、辞表	
(342)	文辞	
(343)	辞表	
(344)	总	
(345)	志、记、辞表	
(346)	文辞	
(347)	辞表	
(348)	总	
(349)	志、记、辞表	
(350)	文辞	
(351)	辞表	
(352)	总	
(353)	志、记、辞表	
(354)	文辞	
(355)	辞表	
(356)	总	
(357)	志、记、辞表	
(358)	文辞	
(359)	辞表	
(360)	总	
(361)	志、记、辞表	
(362)	文辞	
(363)	辞表	
(364)	总	
(365)	志、记、辞表	
(366)	文辞	
(367)	辞表	
(368)	总	
(369)	志、记、辞表	
(370)	文辞	
(371)	辞表	
(372)	总	
(373)	志、记、辞表	
(374)	文辞	
(375)	辞表	
(376)	总	
(377)	志、记、辞表	
(378)	文辞	
(379)	辞表	
(380)	总	
(381)	志、记、辞表	
(382)	文辞	
(383)	辞表	
(384)	总	
(385)	志、记、辞表	
(386)	文辞	
(387)	辞表	
(388)	总	
(389)	志、记、辞表	
(390)	文辞	
(391)	辞表	
(392)	总	
(393)	志、记、辞表	
(394)	文辞	
(395)	辞表	
(396)	总	
(397)	志、记、辞表	
(398)	文辞	
(399)	辞表	
(400)	总	

一、韩愈文说

总说

苏轼《韩文公庙碑》，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者：魏、晋六朝文趋骈偶，其弊者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砌典镂言，理昧辞游；而隋、唐以来，如李谔、王通、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之伦，倡为复古，以文质不能尽称，仅能为发难、前驱之役而已。至退之出，以其雄伟酣畅之文，共新天下耳目，乃能振八代之衰，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而发扬光大之；以复古之名，收创新之实，宏篇大力，转移文章之运会。所谓“道济天下之溺”者：初唐以来，帝王权贵迷信佛、道两教，天下风靡，僧尼众多，寺观占田殊浩，庇役逋租，蠹国伤民，为害甚烈。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宦官当权，朝纲不振，叛乱频仍，而赋役繁重，苛政杂出，人民愁苦，死丧无日。退之力攘两教，宣扬儒学，抨击逆藩，企求统一，欲以弭僧道蠹国之害，复朝廷中兴之局；又力求以其职能所及，陈请设施，蠲民疾苦。所谓“忠犯人主

之怒”者：贞元中迁监察御史，极论官市之弊，又有《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为权臣中伤，斥逐随之，逼迫就道，比于囚徒；元和中为兵部侍郎，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几至戮身，大臣解救，乃得远窜荒陬。此皆为国忘身，不辞犯上。所谓“勇夺三军之帅”者：镇州王庭凑之乱，朝廷“发救兵十万，望不敢前”（《旧唐书》），退之轻身入“严兵拔刃弦矢以逆”之中，面说乱军，义折王庭凑，以解深州之围。临行时，穆宗及元稹皆为之危，帝命“至境观事势，无必于入”，退之奋而不顾（李翱《韩吏部行状》）。至于判祠部时，“日与宦者为敌，相伺候罪过”（本集《上郑尚书相公启》）；为河南令时，“魏、郾、幽镇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士，官无敢问者”，独摘发请加禁止（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任京兆尹时，“禁军老奸宿恶不摄，尽缚送狱，京理恪然”（同上）；任考功郎中时，力主对淮西叛将吴元济用兵（本集《论淮西事宜状》），对藩镇遣人刺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之事不可示弱不究（李翱《韩吏部行状》），抑又其次矣。

如上述，退之生平大节，卓然可观。然其为昔人所讥者，一曰热中功名而多干求。其诗《符读书城南》，教其子：“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诸身，身在则有余。”少年未仕，有《上宰相书》三封，以求汲引；贞元十九年《上李尚书书》，称颂李实，同年迁监察御史，上状指陈京兆于人民遭受旱灾时追迫租税甚酷，又皆实之所为；贞元十八年《与于襄阳书》，称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而頔实聚敛之臣。故陆象山《语录》谓其“不合初头俗了，……《符读书城南》，三

《上宰相书》是已。”陆唐老讥《城南》诗“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张子韶谓《上宰相书》有“略不知耻”之嫌，顾炎武《日知录》谓“不自觉地失言，后之君子可以为戒”。夫《城南》诗，自当时论，诚如黄震《黄氏日钞》所谓：“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况诗篇后文又归于“穷经观史，修饬行谊”，如程学恂所谓：“到底却归到行义上，是岂仅以富贵利达饵其子者乎？”上于頔、李实书，干非其人，不免贤者之玷；然其上实书，为一时干求之误，御史台上《状》，则为后来履行谏职之忠，悯念民困之亟，勇于改过，非同反复。《上宰相书》，公理之论争多于私情之陈请，倔强之概过于卑屈之语，气与文皆不馁，且存之而不掩讳，心事愿与后人共见，亦何可尽非？其二曰既屡斥道教方术，复自饵硫黄所啖鸡而致死。按退之卒前一年，撰《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历举饵丹药致死者数人为戒。自饵硫黄所啖鸡，见陶穀《清异录》，小说家言，本可疑。其说似据白居易《思旧》诗“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且考此退之为卫晏子中立之字，不属韩氏，更不足据。至于与僧人交游，见于文字，实与排佛之事，非水火不容，亦不必论。其为今人所讥者：一曰反对“永贞革新”，阿附宦官俱文珍。夫退之于永贞执政之二王（叔文与伾），或出于私人之嫌猜，或出于政见之同异，或出于形势之所迫，诗中有丑诋之辞，至所作《顺宗实录》，则有褒有贬。且所谓革新之进步史实，尽赖《顺宗实录》以传。《实录》备载顺宗善政，并称颂其私德，非真不存公道，漫诬革新者。附俱文珍事亦失实。贞元十一年，俱文珍为监军，执汴州叛将李迢有

功。是年董晋入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退之为其推官。十三年，俱将入京，退之奉晋命作诗送之，上司应酬，非出己意。自后两人无交往之迹。宪宗继统，退之犹待命湖南，焉得探知深宫秘事而与文珍交通乎？二曰独尊儒学而尊君抑民。此多掇拾《原道》：“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及《拘幽操》“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语，训“诛”为“杀头”，而以“臣罪”二句为极端张扬“君纲”。不知“诛”字于文中为“惩罚”之意，非特指“杀头”；且此数句合其前文，原为论述君民各有分守而言，非专于责民。况有人以为中有兼斥佛、道不事生产、逃避赋役之意者乎？即谓不“出”者当“惩”，而不能“出”者，退之不屡为之呼号请命乎？原文全段，思想有局限，然不宜曲用训诂，加重罪名。《拘幽操》二语，为退之模拟文王被纣拘于羑里，曲写其怨怒心情而作，更何得视为退之本人张扬君权至上之语乎？此而可凭，则与酷吏之罗织伎俩何异？退之攘佛、道，尊儒学，在当时有进步性，稍知治史者胥可自明。且彼于先秦诸子未尽排斥，崇儒学亦与迂儒不同。《读墨子》谓墨家思想有与儒互通者；《进士策问》称赞管仲、商鞅功绩；《论捕赋行赏表》赞商鞅守信以致富强；《行难》赞管仲取人之宽；《读荀》谓荀与扬“大醇而小疵”。《送孟东野序》主“物不得其平则鸣”，异乎迂儒之拘“恶下流而讪上者”；《郭人对》反对割肉疗亲，异乎迂儒之论孝；《旧唐书》本传称其“恃才肆意”，亦有“熬孔、孟之旨”者，可见一斑。

退之为人，丰于情而躁急，豪于气而率易，虽卫道而非道学中人，盖性情中人也。大节无惭于智勇，细行亦不失乎

狂狷。其交友，笃于死生之谊，推奖贤才，汲汲惟恐不及。李观、欧阳詹、孟郊、张籍、李贺、李翱、皇甫湜、贾岛，皆得其称誉或荐拔者。皇甫湜《神道碑》云：“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庇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未尝一日不对客。……未尝宿货有余财，每曰：‘吾前日解衣质食，今存有已多矣。’”“朝有大狱大疑，文武会同，莫先发言。先生援经引决，考合传记，侃侃正色。”又所撰《韩文公墓志铭》云：“先生与人交，洞朗轩辟，不施载级。……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漚以饴口，讲授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巨人长者矣。”其在汴州幕，郁不得志，张籍贻书讽之，以为“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又好为“博箴之戏”。本集《答冯宿书》，自谓权知国子博士时，“在京城，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其性情可概见焉。明薛瑄《读书录》称：“韩子气质，明敏刚正，乐易宽厚，皆过于人。”允矣！其躁急率易，乃不足为病而弥见其慷慨磊落之真，其于“中行”苟不尽合而去“乡愿”则远矣。夫知退之之大节与性情，乃可以知其文章特色之所自来；多读其文，乃可以如日与晤对而弥见其性情也。

退之论文之作用有二端：其一，宗经明道。《上宰相书》自述：“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送陈秀才彤序》：“学以为道，文所以